

彭程《第七只眼睛》

山高水长任纵横

□李佩红

收到彭程新近出版的散文集《第七只眼睛》，想到了家里珍藏着的他的另一本散文集《急管繁弦》，时光飞逝，那已是10年前的事情了。《第七只眼睛》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封面用的是有些粗糙的仿牛皮纸，中间画着一只抽象的眼球和两只手，围拢成眼睛形状，有一种朴素厚重、化繁为简、返璞归真的美感，应就如同作者当下的生命状态。

近来有个流行词“折叠”，受社会思潮的影响，文学也在不可避免地折叠，尤其是散文写作趋向扁平化，缺乏异质和张力。一方面是车毁斗量般的出产，另一方面却是面目模糊，个性和新意稀少，使读者仿佛陷入一片波澜不惊的水面，偶尔溅起一两朵浪花，立刻涌进无数跟风效仿者，形成新的覆盖，不久后再一次趋于平静，于是激不起我再买散文集的兴趣。

携此书远行时树刚发芽，回家已经入夏，推开院门一树繁花照眼，惊喜之中夹杂着陌生。一个人的缺失，造成时空的断裂，变化显得突兀。我联想到，随着时间的线性演进，有些人逐渐矮下去了，有些人却一直在不动声色地生长。这是我读这本书的第一感觉。彭程思想的静水流深，情怀的深广悲悯，文字的成熟苍寂，其实在书中第一篇的《婉》里，已经十分了然。可是这一点我想放到后面去说，先谈谈他精湛的文字表达。

散文是一个人的精神花园。这本散文集收录的30篇散文，有对世相的描摹，有对人生的感悟，有读书观影的心得，内容林林总总，颇为宽泛。读罢掩卷，脑海中浮现出一幅清晰的画面：一个人从青年一直到中年，每天戴一顶草帽，拿一把锄头，在烈日下、风雨里始终如一、孜孜不倦地耕耘，用清新隽永、质朴无华的文字和优美的意境，抒发自己对人生独到的感受和思考，培植出了一方属于自己的五彩缤纷的散文园圃。其中的每一篇作品，都蕴含着作者多年来积累的丰富深刻的人生经验，闪烁着哲思的光芒，回味无穷。暮春时节，去内地学习，我把这本书随身携带，上海、南京、杭州、苏州，一个月辗转五六座城市，始终不离枕边左右，我将书中的精彩片段用笔勾出来，供我一路慢慢地品咂，像小时候含着的那颗糖，不舍得一下吃完。

可以说，这本散文集中的作品都称得上是精品佳作，每篇都令我喜欢，蕴藏着人到中年回望时光的深切感慨和睿智思考。《大地的泉眼》体现了“诗”和“思”的紧密而纯粹的融合，“诗潜藏于大地的深处，节气是它涌现的泉眼……没有什么时候比童年更贴近土地。池塘、树林、果园、草场，这些地方在印上我们稚嫩的脚印的同时，也占据了我们的心灵。诗就是这样同生命结缘。大地是诗之源泉，童年的心灵最容易受到它的浇灌……所以返回常常很有必要。时光一往无前，但自由的心灵却可以回溯，回到过去，那里是有

生命的根。每个人都应适时回去，培一捧土，或者浇一罐水。他会发现，这样他站得更稳。”“我们获得了舒适，却丧失了诗。我们拥有了过多奢侈的东西，却远离了土地。谁能算得清其间的得失？”这样闪光而温馨、意蕴丰厚的文字，像海滩上散落的珍贝，俯拾皆是。在《滚烫的石头》中，他借助民歌表达对文字的爱好：“那是他的信仰、他的念想、他用生命呵护和看守的东西，海枯石烂，生死以之。”在《错位》一文中，他认识到“愚昧是怎样测量都探不到底的，可恨的是它们偏偏要同智慧纠缠在一起”。在《独自品尝》中，思考和追问真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挟带了痛楚之感的尖锐：“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一种点头之交，习惯于维持一种敷衍清浅的关系……朋友这两个字，如今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蜕变，常常不过是利益的代名词，或聚或散，尽皆系于某种筹划，让人内心深处不由得渗出一股凉意……人忍受自己的苦难，每每已经心力交瘁了，如果对他人的痛苦也毫不保留照单全收的话，岂非将马上面临断裂和灭顶？”

这些对社会、对人生透彻犀利的看法，“都不是交流的产物，恰恰相反，它们是在作家个体的沉思、冥想中产生（谢有顺）”，是人到中年之后，“当一个人经历的步伐抵达某个年龄里程时，才能领会其中所蕴含的深意，因为渗入了足够多的时间。时间就如同冲洗照片所使用的感光剂，使得生命中原本幽暗晦涩的某些东西，渐渐显现，变得可以辨识和分析。”（《急管繁弦》）这些电光石火一般闪耀的思想，增加了这本散文集的厚度和重量。

当然，作者也并不都是像苦行僧般的枯坐冥想，他也时常瞩目于日常生活中的声色形相，发掘其中的美和善，显露出作者柔软温情的一面。《招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篇文章不长，却十分出色地写出了深挚动人的亲情。他与父母相邻而居于同一个小区里，“他们和我，父母和儿子，每天清晨，一方在院子里，一方在房间里，隔着几十米的距离，相互招手。这个动作，成了每天固定的节目。”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像个孩童玩捉迷藏，故意不回应向他招手的父母亲。结果是父母回到房间后，焦急地打来电话询问，语气中充满了担忧。这让他既感动又愧疚：年龄再大，我们在父母面前都是孩子。从那之后，“招手对我便有了一种仪式般的意味，做完了它，我才会感到心里踏实，这一天的开始也就仿佛被祝福，有了一种明亮和温暖。对父母而言，这个动作的意义会更大。当脚步日渐迈向生命的边缘时，亲情也越来越成为他们生活的核心。”又比如在《周围》中，“一个冬夜，骑着自行车在炉灰渣、冬储大白菜垛之间的狭窄通道中小心穿行，感受着后座上惬意的重量，姑娘的胳膊羞涩地、若即若离地箍在我的腰上，至今想来都感到一缕温暖。”如此生动的画面，似乎一转身便会消失，却被作者敏



锐地捕捉到，并用文字固定下来。正如他所说的，“在阔大的背景中，在旋生旋灭的千万种场景中，这样的画面，只能算上一个极端微小的细节。但它们是属于我的，是我灵魂中的小小芒刺，使我有一种幸福的疼痛。”散文集最后用一篇有关一座城、一个单位、一个人20多年的生命经历和生命思考的长篇散文《周围》来收官，应该体现了作者深刻的用意。这是一个有意强调的重音，通过对浩渺繁复的生活表象进行发酵和蒸馏，把生命中最深刻最本质的东西给予了生动的揭示和呈现。城未老，人已变，此后从容把盏，采菊东篱，人生将进入另一种境界。

现在再回到本文的开始。彭程在《婉》中这样写道：“因为某个机缘，你分得了一支笔，从此她陪伴你，如影随形。你不喜欢喧嚣，又羞于向外人吐露自己，这时这支笔成了你。你写下自己的热情和悲哀，梦想和谵妄。”于是他不急，“慢慢地写，字斟句酌。停下，挑拣字眼儿，再写，再停下。如果思路常常如一沟滞涩的水，艰难地流动，那么手里的笔仍然是一尾鱼——围在词句的美丽的栅栏中，困于意义的幽暗的网罟内，左奔右突，一尾不自由的鱼儿。”因为他明白，既然选择了文学这件大事，那么，“大事需要淳朴憨厚的心灵、坚信和虔诚、毅力和耐心，与时间的相守相忘。诚笃朴拙比机敏灵巧更值得称颂。”（《大事不着急》）多年的坚持，这一尾思想的鱼儿终于突破了语言的拘围，获得了充分的自由，抵达了一种令人向往的广阔和幽深。这样，写作的意义也得到了充分的呈现，“我在写下文字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

彭程为人真诚，不虚饰，不敷衍。对待他挚爱的散文写作更是如此，舍得耗费心力去感受、思考和表达，仿佛燕子啄泥筑巢一般，力求达到心目中的理想状态；又像是运筹一场战役，稳扎稳打又出其不意，一步步地攻陷读者的心垒。在他看来，散文的领域堪称山高水长，足以安放一个写作者全部的身心性命，那么，祝愿他在这一片天地间策马扬鞭，纵横驰骋，不断抵达属于自己的远方。

里下河文学研究专栏

开拓与守候

——浅论朱辉的中短篇小说 □汪雨萌

朱辉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创作伊始是从中短篇小说入手的，创作形式与手法最为多样化的也是他的中短篇小说。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契诃夫、莫泊桑式经典短篇小说，也能看到先锋的、实验性质的后现代主义篇目。用朱辉自己的话来说，他的这种创作是“抓痒式写作”：“年轻时逮什么写什么，哪里有感觉了，哪里痒了，就去挠挠，抓上两下。”

朱辉早期有很多实验性质的小说，对成长于上世纪80年代的作家来说，这种获得性小说性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事。比如《鼻血》《青花大瓶和我的手》《变脸》《镜子里的陌生人》等等。这些小说虽然是在日常生活的情景框架之中展开叙述，但是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某种荒诞的意味。《变脸》讲述的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因为一种奇异的可以改变脸上的肌肉分布和表情的绝活而得志，也最终因此而颓败的故事，它一反传统小说中“变色龙”式的原型叙事，而以悲剧的眼光看待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挣扎与无可奈何，人不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只剩下一张脸，成了一个符号。现在已不是古典社会，符号不是稳定而是多变，于是人不得不通过符号的改变来适应这个多变的符号系统，随着叙事的推进，故事必然走向荒诞。又如《青花大瓶和我的手》，这也是一具具有荒诞意味的作品，青花大瓶碎了，但“我”有一双能补瓶的神奇的手，但是当里外配合补好了花瓶后，“我”的一只手却拿不出来了，只得又将花瓶打碎。什么是修补，什么是破坏？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手段？乃至生活，乃至人生，意义又在哪儿？不但是喻意，还有它的叙述方式也呈现出相当的现代感，技术的味道特别鲜明。朱辉用了近八成的篇幅来描写在一个晚上、甚至是几个小时内发生的故事，将一件不太复杂的事情演绎成了繁复的“卡农式”的节奏，在这个相对纷繁而冗长的整体结构中，又大量地运用了对话、短句和切割段落的方式使得小说的节奏充满了停顿和跳跃，到了小说的末尾，他的演奏却戛然而止，换了一种仿佛日记般流水账的方式平铺直叙地展现了故事的结局，将多种叙述手段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人工化的复杂。另外，他不仅在小说创作的手法上追求某种科技感和人工化，一些理学术语也同样可以为他所用，他的《绝对星等》讲述的虽然是在地感强烈的故事，却使用了“光年”、“暗物质”等词汇作为每一章的标题，既使科技感的冰冷与人心不古的冷漠相互映衬，又是某种星辰大海的理想主义与琐屑市侩的物质主义的碰撞，使得原本日常的叙述显露出某种空旷而伟岸的调性。

朱辉的另一些作品，却仿佛没有什么“技术”，甚至不在乎情节的冲突和推进。这些作品平实、家常、细致、耐心，将传统写实小说的美学韵致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小说的诗化也是朱辉时常营造的，它体现出作家早期的唯美主义倾向，这种诗化来自他对小说表达“心情”，表达诸如悲悯、伤感等等情怀的理解。《看蛇展去》就是一篇伤感而温情的小说，写两位少年金良和刘健徒步到邻县去看蛇展，少年的好奇、冒险、恐惧和奶奶的疼爱让人过目难忘，与长堤、运河、乡间小道等意象永远留在人们的心底。再如《红花地》，这是一篇带有散文笔调的作品，显示出朱辉营造氛围的能力，乡村的风景、生活的节律、亲人的关爱与小说的主人公李钦的亚健康构成了一个对比性的意义组合，李钦的时代病由谁来疗救就不言而喻了。这样的情节底色与写实一样是朱辉小说的基调之一，《七层宝塔》是他近年来的代表作，但在他笔下，红花地中温厚淳朴的乡村已经不复存在，它被推平了，改建了，变成了“新农村”。乡村关系不再，乡村的精神内涵与极具象征意义的古塔显然也不合时宜，必须坍塌了。从《红花地》中怀着温柔刻画乡村，到《七层宝塔》中带着悲悯缅怀乡村，同样是精神寻根，但在朱辉的笔下，这种寻根也是与时俱进的，他不再刻意营造某种唯美的诗意，如今的他正在消解田园意象，消解诗意的道路上，让自己的创作主题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与深入。

朱辉并没有止步于此，他更多的作品除了近于世俗的绵密的叙事，对故事、对戏剧性也有着非常的偏爱，所以，朱辉的很多小说具有相当的阅读上的亲和力，像《苏辰梦见了什么》《老汤》《一箭之遥》都是一些很“抓人”的篇什。以《红口白牙》稍作分析，小说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是体育老师萧榕平淡而寂寞难耐的退休生活。二是年轻人“小驹子”空虚的青春和对空虚无望的挣扎。这两条线索直到小说最后萧老师的讣告前，朱辉才如亮底牌一样告诉读者，小驹子就是萧老师的唯一的“不成器”的儿子。而这一交代又促使读者将此前的阅读重新梳理，这两条线索在小说的叙述中原本是时常交叉的，只是由于小说叙述的闪转腾挪让人忽略了。朱辉很轻松地制造出了富于戏剧性的阅读效果，显示出叙事的主体性的优势地位。朱辉不仅在戏剧冲突与小说情节推动的技巧上下功夫，他对人物关系的执著也是他创作颇具特色的一点。在碎片化的时代中，人物形象似乎也必须被切割成碎片，我们现在已很难在短篇中看到传统的完整的人物形象。而通过关系来刻画人物，将人物之间的关系作为桥梁和镜面，是

陈毅达《海边春秋》首发于《人民文学》2018年7期，是《人民文学》在“新时代纪事”栏目刊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该作品同时被列入2018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选题。小说以“春秋”命名，作者陈毅达突破传统的全知叙事，并充分借用史传传统在小说叙事模式中的作用，以小人物为线索展开新时代的现实题材书写。由于中国小说初创阶段对史书和诗歌的借鉴，“史”和“诗”的文体传统已在相互渗透中共同作用于中国小说的审美意趣；在内在倾向上，史传的实录传统没有使小说放弃叙事上的虚构，而诗歌的抒情言志传统也没有阻碍小说的叙事职能。而不同时代、不同学养的作家又存在着艺术水准、思想倾向、行动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文史传统于中国小说的具体影响也自然呈现出诸多面相，这使我们搭建起探讨《海边春秋》的广阔空间——作家对社会场面的细致描写贯通时代现实，对人民和生活的真切观照则延伸出更为统一的新时代风貌。

“春秋”：名与实

《人民文学》当期卷首语对《海边春秋》的故事内核作如下表述：“从北京名校毕业回闻工作不久的文学博士刘书雷，被派往距离海峡对岸最近的开发热土岚岛挂职，进入了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现实熔炉，从好奇、热情、不懂、慌乱，再到倾听、观察、分析、判断，直至扎实实地与生活实地的人心、实情和史事、蓝图相融。他遭遇了复杂而繁多、具体又紧要的疑难事项，也从实践中磨砺出了面对问题的辨别力、解决能力的穿透力。”刘书雷围绕兰波国际项目与蓝港村整体搬迁的矛盾展开工作，攻克克难主题之下，陈毅达通过对事件各个关节的娓娓道来构建自己的价值判断，尽管小说叙述是对复杂真实的虚构，独特的解读与表述方式中，作者选择对整个事件和事件中的各种因素直书其事，本位主义、决策简单和作为不力等现象并未被置于书写的阴影处，干部、开发商与村民的形象也因而真实可触。

钱锺书先生曾道：“两汉时期最有后世影响之理论为‘春秋笔法’，自史而推及于文。”因此，我们不难从《海边春秋》的小说题目推论小说在创作手法上的趋向。

《春秋》“尚简用晦、文约而指博”，所谓“微言大义”、“借事明义”，均是表达“善善恶恶”的话语模式。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所云：“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辱，五曰惩恶而劝善。”以《春秋》“五例”为基本内涵的“春秋笔法”突出地将劝善惩恶的思想原则与法度融于审美价值和修辞方法，而“经法”意在惩恶劝善，故求其善；“史法”意在通古今之变，故求其真；“文法”意在属辞比事，故求其美，其中也不乏对《诗经》“兴观群怨”和比兴传统的借用与发挥。

陈毅达《海边春秋》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大背景下，书写援建岚岛项目的落实经过：干部、开发商与村民中没有善恶，而矛盾的化解以刘书雷与张正海的工作逐步达成，以己度人之心透露出人性的善良，在整体的发展面前各方努力寻求协调和平衡，此乃经法之“善”；岚岛确有其岛，“从过去的海防前线，变成了福建省开放开发的新热点”，“东邻台湾，与台湾的新竹县相距仅有68海里，是闽台之间最靠近的地方，为两岸融合的摇篮；毗邻港澳，是中国大陆面向亚太地区的重要窗口之一，扼守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为福建省第一大、全国第五大海岛，面积是厦门岛的两倍”，此乃史法之“真”；岛上村民有以大依公为代表的传统人格风骨、也有包括海妹在内的“海上蓝影”新青年群体，岛上生活生动的细部，无论是海蚀地貌和集中形成的石厝群、海底文物、海上摩尼光佛等，还是女老板开的农家饭馆、台湾歌手余望雨的音乐创作室、虾米为等待父亲和祖孙生计卖画为生、林晓阳有着诗人气质和属地基因等，连同具体的诗歌的引用和诗性的刻画，新时代里实现可能的生活被一一勾勒，此乃文法之“美”。

再有，后世的《春秋》三《传》，以《左传》最重史实记述，而《公羊》《谷梁》皆重大义阐发，详于解经，于义理上多有功，史实的记载阐发强烈的人文意蕴。史传传统与小说叙事的关联便在于此，尽管从实录其事到文学想象的再创造之间存在着审美方式的重新确定——作者通过叙事时间、角度、视域及叙事时态的选择营造出大事、奇事、日常事在文学表达中的审美意蕴，由“史”与“实”生发那些与国家、民族兴衰有关的理想与意志，在文学的虚构里传递人文精神与关怀，文学由此在与史同样的纪事本末叙事之外拥有了超越自然时间的独特新意。

与时代共同成长

尤为可贵的是，小说虽将博士刘书雷作为现实题材书写中的重要线索人物，作者陈毅达却没有把他全能化，小说中的刘书雷甚至还不是共产党员，他有职场里常见的心理活动和小算盘，也有兼济天下的抱负，他听从导师的意见，也对领导察言观色，同时对自己的辨别力和判断力有所坚持，而这一切都使刘书雷的人物形象得以真实地确立，因而他作为干部的成长、能力的提升、心性的转变乃至自然而然想要加入共产党的愿望也无比可信。

事实上，小说里成长的不仅仅是刘书雷，以他为代表的善于思考、攻坚克难的本地干部，从懵懂莽撞到懂得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岛上新青年群体，常年外出打工转而终于回村创业的岛上村民、由谋利到谋发展的企业家们等等，甚至，陈毅达在文中采用领导人的真实成长为小说内部人物和外部读者树立榜样——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有一个中国的年轻市委书记，在去美国一个友好城市交流访问时，提到他无意间看到了一则新闻报道，了解到一位加州大学的物理学家，曾在一个叫鼓岭的地方度过快乐的童年。但六十多年后，这位教授不幸患上了失忆症，可是经常念叨着鼓岭，这让他的夫人十分意外、困惑和感动，决定帮助丈夫找到这个魂牵梦萦的地方。他的夫人不知道如何着手，也不知道鼓岭在哪里，无奈之下就只好请一个报社记者帮助。这位市委书记看到了报道之后，就立即联系上了教授夫人，并盛情邀请这对夫妻前去访问鼓岭。教授和夫人到鼓岭访问期间，这位市委书记还专门抽空接见他们，请他们吃饭，并嘱咐相关负责人一定要接待好照顾好两位老人。这位教授和夫人终于结了了结了最后的心愿。说这个故事的人，曾是这位教授的博士生。他告诉董事长说，这位充满人格魅力的年轻市委书记，现在可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一幅与成长、发展密切相关的斑斓画卷由人物形象的丰富得以呈现一个时代的纵深与壮阔：远洋货轮“蓝影”号事件关联的几代岛民，渔村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以人文精神搞建设和省文联送演出进岛，两岸关系的转变和打通两岸创意文化合作渠道，打造两岸文化交流平台，蔡思蓝、胡老板的回村认捐等等，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颇具群像意义，同时在这个意义上绵延出强大的感召力，同时昭示出新时代干部应有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企业的责任与担当和以人民为重心的发展思想。小说里，援岚干部们反复阅读学习总书记在闽东任地委书记时写的《摆脱贫困》、《行动至上》的思想，科学地强调了改革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凸显了实践的哲学意义。小说以取得攻坚克难的成功为结局，在故事情节和方法论上均与此呼应，援岚干部们以实地考察为出发点，将所遇、所游、所闻、所见、所想，形成细致、全面的报告和方案，同时认真学习中央的相关文件、精神，最终发现并解决了小说里真正的矛盾——“当时出发点是替他们的利益着想，但是却把利益当作他们的愿望了。”

新的文学激活

刘知几《史通·二体》云，“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述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中国古代史书中，编年体以时为主，纪传体以人为主，及至《通鉴纪事本末》出，以事为主的史书体裁开始出现。在历史主义与史传传统的断裂与续接中，陈毅达《海边春秋》以事为主，以人物为关键线索，反映新时代的现实题材，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为岚岛的发展树碑立传。事实上，现实题材的文学书写离不开对真实经验的表达，而任何文学创作也离不开历史意识。

当下的文学样本里，表达的是一种正在发生着的历史和历史观，因此，这种文学书写在自身独特的文学性之外还承担着对时代把脉、捕捉时代现象、倡导时代真实的重大责任，而如何在“文”与“史”、“文”与“实”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以此激发当下现实题材创作的文学活力，以文学的内部真实提供外部现实的可能性，将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文学新课题。